

# 认知叙述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云 燕

**[摘要]** 认知叙述学是叙述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学科，是后经典叙述学的重要一员。追溯认知叙述学的兴起过程，澄清其学科定位，并考察认知叙述学在中国的发展，能够使认知叙述学呈现出清晰的轮廓。认知叙述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探讨其面临的问题和发展方向，有利于对其开展进一步规划和建设。

**[关键词]** 认知叙述学 学科定位 发展方向

DOI:10.13760/b.cnki.csalt.2015.0021

## 一、认知叙述学的兴起

认知科学是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探究人脑和心智工作机制的前沿性学科，它将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整合在一起，研究人的认知过程中信息如何传递和被理解。研究意义生成阐释的学科与认知科学都有着不解之缘。

认知科学与文学艺术研究的结合萌芽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有学者认为，罗兰·巴尔特所著的《S/Z》中就已经显示出了认知的萌芽，表现为超越了结构主义主要关注文本的狭隘方式，开始关注读者的阅读过程。1992 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瑞文·图尔 (Reuven Tsur) 的《走向认识诗学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拉开了认知科学和文学艺术研究相结合的帷幕。图尔建立的认知诗学主要是一种综合了形式主义、认知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文学批评，并且作为一种狭义“诗学”，只把诗歌作为其研究对象。2002 年，美国学者彼得·斯托克维尔 (Peter Stockwell) 的《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扩充发展了图尔的理论。斯托克维尔认为，认知诗学应该是一种广义的“诗学”，一种关于文学研究的系统理论，但其在这本论著之后的研究中基本是融合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如何把认知语法、图式理论、语境框架、图形—背景理论和心智

空间等理论用于文本分析，来研究文学接受和阐释，实际上囿于文体学研究范畴，也并未形成他期待中的系统理论。斯托克维尔自己也表示，在他的研究中，认知诗学和认知文体学实际上是同义的。有些学者认为，认识诗学和认知文体学的区别仅在于认知诗学主要研究文学艺术作品，而认知文体学的研究对象更广，不仅限于文学艺术作品。

文体学和叙述学虽然有所重合，但终究是两个学科，文体学偏重研究语言遣词造句的技巧及其效果，而叙述学偏重研究语句的结构安排，“小说的艺术形式包含文字技巧和结构技巧这两个不同层面，文体学聚焦于前者，叙事学则聚焦于后者”<sup>①</sup>。如果认知诗学是一种系统理论，那么认知叙述学就应该从属于其下，是认知诗学的一个分支；如果认知诗学仅仅相当于认知文体学，那么认知叙述学就是和其平行的一个学科，专注于对叙述文本的结构、创作和阐释的认知基础研究。目前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和认知叙述学三者混称的情况非常严重，它们的研究范围存在交叉，这点毋庸置疑，但弄清每个学科的理论本位还是重要的。相对于认知文体学、认知诗学对文本语言层面的关注，认知叙述学更注重对叙述文本意义解读的研究。认知叙述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只要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文体学、认知诗学等理论资源都能够成为认知叙述学的有益借鉴。

认知叙述学肇始于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1996年的论著《走向“自然”叙述学》（*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她提出读者的认知过程就是文本被二次叙述化的过程，并以口头叙述为蓝本研究了读者如何将文本进行“自然化”理解。“认知叙述学”作为术语最先出现于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的论文“Frames, Preferences, and the Reading of Third-Person Narratives: Toward a Cognitive Narratology”，但西方学界一般认为“认知叙述学”被正式认可始于2003年美国学者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所编辑的论文集《叙述理论与认知科学》（*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这本论文集收录了西方几位著名的认知叙述学家的最新成果，分为叙述和认知的方法、作为认知资源的叙述、认知叙述学的新方向和虚构思维四个部分。赫尔曼在导言中指出，叙述正在成为与认知相关的诸多跨学科研究的中心，从认知的角度研究叙述，主要是研究接收者在创作和理解叙述时的心理表征以及叙述文本的认知线索，同时，叙述也能作为认知的工具，促进人的认知能力的发展。

戴维·赫尔曼给认知叙述学下了定义：“认知叙述学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它将（经典）叙述学的概念和方法与源自认知科学（如心理学、人工智能、心理哲

<sup>①</sup> 申丹：《文体学和叙事学：互补与借鉴》，载于《江汉论坛》，2006年3月，第65页。

学等)的概念和方法相结合,目的是为从事叙述结构和叙述阐释研究的理论家们所提出的范畴和原则建构一个认知基础,以弄明白叙述生成和理解中起作用的符号结构和认知资源之间的关系。”<sup>①</sup> 赫尔曼的定义点明了认知叙述学的跨学科性质,及认知叙述学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一是研究叙述文本结构的深层认知策略,二是研究叙述生成和阐释的认知心理基础。

目前认知叙述学的研究成果多种多样,戴维·赫尔曼在2013年9月更新的网络版*The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的“认知叙述学”部分介绍了目前西方几个比较热门研究方向:对叙述文本可能世界诸要素的探讨;研究文中的因素(时空、视点等)如何影响文本接收者的认知心理状态和认知进程;研究叙述悬念的文本策略和接收者的移情心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创作者如何塑造和阐释者如何理解叙述文本中人物性格;根据实证性的语料库分析“文本特征”和“文本效果”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叙述功能作为认知框架体现在不同媒介中的异同;研究普通心理学中人如何理解他人意识的认知心理和叙述文本的阐释者如何理解人物意识的认知心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灵感和叙述思维的关系等。<sup>②</sup>

现今认知叙述学的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不但像戴维·赫尔曼、莫妮卡·弗卢德尼克、曼弗雷德·雅恩、玛丽—劳尔·莱恩(Marie-Laure Ryan)、安斯加·纽宁(Ansgar Nünning)等著名学者仍保持着旺盛的学术创造力,不断推进其发展,认知叙述学也不断在西方之外的国家开疆扩土,但目前还没有达成其“诗学”体系的宏大志愿,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赫尔曼也指出,认知叙述学的研究范围还在不断扩大,未来的发展方向还要拭目以待。

## 二、认知叙述学在中国的发展

截至目前,认知叙述学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西方认知叙述学理论的推介和阐发,二是利用已有理论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阐释。

认知叙述学是由申丹首先引介到中国的,她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是国内最早对西方认知叙述学的介绍及评论。这篇论文讨论了认知叙述学的本质特征和不同研究模式,指出认知叙述学关

<sup>①</sup> David Herman, “Instruction”, in David Harman, e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2003, p. 20.

<sup>②</sup> David Herman, “Cognitive Narratology”, in *The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Hamburg: Hamburg University, abstracted from <http://www.lhn.uni-hamburg.de/article/cognitive-narratology-revised-version-uploaded-22-september-2013>.

注的还是类型化的认知规约和文本接收者，研究的是文本接收者的认知过程的共性，而不是个体接收者的阐释特点。申丹还介绍了当前西方几位著名学者各自开创的文本认知模式。一是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在《走向“自然”叙述学》提出的：“‘叙述化’就是借助于规约性的叙述阐释框架把文本加以‘自然化’的一种阅读策略。”<sup>①</sup> 申丹认为弗卢德尼克以口头叙述为蓝本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性，但是难免以偏概全，并引用了阿尔贝（Jan Alber）的研究说明“自然化”策略不适用于追求荒诞意义的叙述文本。二是戴维·赫尔曼提出的“作为认知风格”的叙述，讨论了文本接收者如何根据文本中设计的认知策略建构和更新自己大脑中的认知模式，并讨论了不同媒介文本的认知策略。三是玛丽-劳尔·莱恩根据认知地图理论分析了文本叙述空间的建构及其认知策略。四是马瑞莎·鲍特鲁西（Marisa Bortolussi）和彼得·迪克森（Peter Dixon）提出的以文学实验的实证性研究为基础的心理叙述学。但申丹指出，心理叙述学实际上是把研究文本机构特征，讨论以叙述规约为基础的读者的叙述认知。对读者进行心理实验这三种方法并用的模式，并非仅仅依靠心理实验。申丹认为这些研究较好地揭示了“文本提示”、“文类规约”和“规约性认知框架”<sup>②</sup> 的互动。

其后国内不少有志之士都陆续开始深入了解和阐发认知叙述学理论。唐伟胜和黄小明 2005 年的论文《叙事性的认知图式及认知基础》讨论了叙事性与读者之间四个层面的认知图式。唐伟胜 2008 年的论文《阅读效果还是心理表征？——修辞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的分歧与联系》进一步分析了修辞叙述学和认知叙述学的关系。尚必武在 2010 年前后先后翻译了杰拉德·普林斯、詹姆斯·费伦、莫妮卡·弗卢德尼克、扬·阿尔贝等数位西方著名叙述学家论述后经典叙述学，尤其与认知叙述学相关的文章，并着重探讨了有关“不可靠叙述”的认知研究方法。张万敏在 2011 年发表了《认知叙事学的引进与文学研究的新拓展》，并讨论了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和戴维·赫尔曼的认知叙述学思想。之后，几位学者都出版了相关论著。申丹和王丽亚在 2010 年出版的《西方叙事学：经典和后经典》有专章对认知叙述学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张万敏在 2012 年出版的《认知叙事学初探》介绍了认知叙述学在西方的流变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并着重推介并阐发了马瑞莎·鲍特鲁西和彼得·迪克森开创的实证性认知叙述学流派——心理叙述学的研究方法。心理叙述学强调以文学实验证明其理论观点，从文本的线索探求如何寻找叙述者位置，并探讨了客观的文本特征和主观的文本效

① Monika Fludernik, *Toward a "Natural" Narrat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34.

② 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 年第 9 期，第 1 页。

果的区别和联系。唐伟胜在 2013 年出版的《文本语境 读者：当代美国叙事理论研究》也辟出专章讨论了认知叙述学，主要包括认知叙述学的本质和研究任务、“可然世界”理论、图式理论以及叙述人物的认知理论几个方面，其中不仅有对文本阐释的程序——图式的研究，也有对文本结构和文本具体要素的功能性研究，属于对西方认知叙述学前沿成果的推介。尚必武在 2014 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介绍了西方后经典叙述学目前的发展方向和态势，也涉及认知叙述学的相关研究。

中国学者对认知科学和文学艺术交叉研究的兴趣还有相当部分集中在认知诗学或认知文体学层面，熊沐清、苏晓军、刘世生、孟胜昆、胡壮麟等学者都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在 2012 到 2014 年期间还有三本研究专著出版。无论是认知叙述学研究还是认知诗学或认知文体学研究，参与的学者基本上都任职于高校外国语学院，从事外语语言专业研究，故而更加偏重与认知语言学关系紧密的认知文体学研究。研究认知叙述学的学者往往也会同时进行文体学研究，有时不免将二者的研究相互混淆。这也造成中国学界对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认知叙述学三者的异同格外关注。

2008 年，中国召开了第四届中国英语研究专家论坛暨首届全国认知诗学研讨会，之后在 2011 年、2013 年分别召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认知诗学研讨会。同时，在 2010 年和 2012 年，也分别召开了全国首届和第二届认知诗学高层论坛。2013 年还召开了首届认知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自 2008 年以来，认知科学和文学艺术交叉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如火如荼。这些认知诗学会议主要由各高校的外国语学院主办，也有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的鼎力支持。考察会议内容，也都以认知诗学为主要议题，把关于认知诗学的文学研究作为分议题之一。在认知诗学有关文学研究的分议题中，大部分研究也是用认知诗学即认知文体学理论阐释文学文本，且大部分是诗歌文本，关于认知叙述学的研究相对较少。在诸次会议中，认知诗学的学科定位以及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认知叙述学三者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热切讨论的对象。不少学者还就此专门发表了论文，来厘清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谈关于认知文体学的几个问题》（申丹，2009 年）、《国外认知诗学研究概观》（苏晓军，2009 年）、《试论认知诗学研究的演进、现状与前景》（蒋勇军，2009 年）、《认知诗学再思考》（孟胜昆，2012 年）、《认知文体学及其与相邻学科的异同》（胡壮麟，2012 年）等。各人的观点虽然略有不同，但基本认可目前认知诗学研究大致等于认知文体学研究，而认知叙述学和认知文体学的研究范围有交叉，但研究方向不同。

考察学术论文的情况，相关研究数量不多，研究深度和广度也非常有限。国内认知叙述学的发展还处在跟随西方理论进行学习和了解的阶段。西方认知叙述

学理论尚未形成系统，中国的研究少部分是对国外理论研究的推介，大部分还集中在借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文本，属于应用型研究，至今还没有一本国外重量级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中国学者对认知叙述学这个学科的构建尚未有什么影响力，而且国内研究者基本聚集在外国语言研究专业领域，故而研究方向也倾向于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认知文体学，与多具有跨学科的理论背景的国外研究者相比，也显得缺乏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潜力。对叙述学领域来说，仅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显然无法应对叙述文本的复杂组成和生成阐释的复杂心理机制。将认知科学与叙述学进行结合研究，就要求研究者不但要对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学科有综合了解，也要具备较高的文学艺术理论素养，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能力，才能在认知叙述学领域有所建树。

### 三、认知叙述学面临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经典叙述学强调普遍叙述规律，脱离了具体语境。认知叙述学为叙述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不但丰富了叙述学的范畴，也推进了文学艺术理论研究。相比经典叙述学，认知叙述学克服了其对文本接收者的忽视，顺应当前西方语境化热潮，注重语境的影响，其理论基础学科认知科学仍在如火如荼的发展进程中。认知叙述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拥有强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必须看到，认知叙述学虽然是后经典叙述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它的发展也一直伴随着质疑声。

一是有学者提出：“认知叙事学的主要功能是为文本结构与叙事各主体之间提供认知心理解释，而不是帮助发现叙事文本新的意义。”<sup>①</sup>而且仅仅借用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对意义复杂的叙述文本解释力有限。如何构建富有解释力的能够与叙述学理论相结合的认知叙述理论，是认知叙述学能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点。

二是认知叙述学虽然关注语境和文本接收者，但认知叙述学研究的还是“某一类型之认知规约，往往不考虑个体读者的背景和立场”<sup>②</sup>。这虽然算不上什么缺陷，但是对比经典叙述学，也并无建树。是否能考察个别文本接收者的不同解读方式，也是认知叙述学的一个重大挑战。

三是认知叙述学的研究偏重于意义获取的认知过程的分析，但是叙述作品往

<sup>①</sup> 唐伟胜：《叙事研究中的认知取向——〈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评介》，载于《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sup>②</sup>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4页。

往是文学艺术作品，要诉诸人的审美情感。人理解外界信息的心理活动可分为感知、思想或心理的意象、情绪三个层次，在人的认知过程中，三者密不可分。情绪常常会启动文本接收者的认知努力，也会改变其认知能力。认知叙述学研究目前对接收者情感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这也是认知叙述学应该努力突破的一个方向。

认知叙述学吸收了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理论资源，以人的心智认知能力理论为基础，开创了叙述研究的新维度和新领域。这也体现了目前的认知叙述学与认知诸学科，如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共同倡导的向“人的因素的回归”<sup>①</sup> 的热潮。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叙述文本由文本发送者创作出来，是“一次叙述化”，而叙述文本被文本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意义的故事，是“二次叙述化”。从文本发送者到叙述文本，再到文本接收者这个信息传递过程中，“人是认知主体”，两次叙述化靠的都是“人类经验范畴之间的互动产生意义”<sup>②</sup>。发送者和接收者都能够理解文本的基础在于二者有能够沟通的“经验范畴”——认知图式，与人切身相关的语境会影响人的认知图式的形成。人的交流必须通过媒介，所以就要设计出带有认知策略的符码赋予信息以形式。从人的认知心理来看，人对叙述文本信息的解读不仅仅是理解其意义，还会对其产生相应情绪，并改变人的认知能力。这是一个认知过程，认知叙述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其中的规律。这和戴维·赫尔曼对认知叙述学的定义是一致的。

认知叙述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研究叙述文本生成和阐释的认知基础，即研究文本发送者进行创作的心理机制，以及文本接收者进行解读的心理机制。前者侧重于将信息编成符码，要考察其启动和推进的心理进程，后经典叙述学尤其强调语境对其的影响。接收者的解读则要考察接收者如何以文本和自己的认知图式为基础去推求文本发送者编制的符码，这就要考察接收者的注意力、知觉与图式识别、记忆的调动机制、情绪等几个心理范畴之间的互动。这种研究如同申丹所说，确实研究的是人的普遍认知规律。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叙述文本如果有被广泛接受讨论的可能，那么在文本接收者群体中必然有一个能够被大多数人认可的阐释。通常这部分人被称为阐释社群。如果每个文本接收者的解释互相之间都千差万别，那么一个叙述文本就如同巴别塔，将永远无法被认知。这正是发挥认知科学的实证性长处的地方。对文本接收者进行实验调查，考察阐释社群的认知规律，从而建立起一个能够适用于叙述学，能够应用于不同文本接收者

<sup>①</sup> 王铭玉、于鑫：《从索绪尔看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9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

<sup>②</sup> 郭鸿：《认知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的认知模式，是认知叙述学的研究重心。这个模式能够显示文本的意义如何生成，也能够显示出不同的文本接收者对文本解读不同的原因所在。目前的认知叙述学研究成果仅涉及其中的某些层面，弗卢德尼克对文本解读程序的考察颇具影响力，但其缺陷是过于依赖直觉，并把口头叙述模式当做唯一准则。构筑一个符号信息传递过程的认知模式，是认知叙述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另一部分则是研究叙述文本中设置的认知策略，这就要考察叙述文本各个要素的设置。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戴维·赫尔曼和曼弗雷德·雅恩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视点或聚焦的认知策略；赫尔曼还研究了文本结构的认知风格以及文本中的时间认知特点；玛丽—劳尔·莱恩从实验的角度研究文本的空间设置和文本世界作为“可能世界”的构建原则；安斯加·纽宁研究了不可靠叙述的认知框架；艾伦·帕默（Alan Palmer）研究了文本中人物思维的认知策略等。这些从认知科学发展而来的理论被引入叙述文本研究，打开了解读文本意义的新视野。从各个学者的研究实践可以看出，这些新的方法绝不仅仅是为经典叙述学解读文本的方法加以心理学和语言学证明，而是构建了许多新的认知解读方法，并能够从新的角度加深对叙述文本意义的理解。对文本各要素的认知研究绝不仅仅是以上提到的这些，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还有非常广阔开拓空间。

认知叙述学正处于学科上升期，它以人的认知机能为基础，贯穿了文本信息传递的过程。作为对经典叙述学的补充和超越，认知叙述学期望创建的认知模式是一种拥有诸多元素组合的动态发展模式，它允许变量参与调整，可适用于不同文本接收者，也不断吸纳新的元素，从而增强对文本的解释力。它并非以建立一个完备的系统为目标，而是以追求文本解读效果的最大化，探寻如何实现理想的交流为主旨。认知叙述学的建设任重道远。

#### 作者简介：

云燕，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